

「就是祖國炊烟，

我們都覺得親切

香甜……………

俄國古老的詩句

第一部

彼得·謝明諾維赤。巴沙金經過了將近三年的出使外國以後，歸返自己的家鄉斯摩林斯克來了，更確切些說，是斯摩林斯克的附近，是區中心普哈沃。這是在今天——戰爭以後，他的家庭所住的地方。

是上午十一點鐘的時候，據車長說，到普哈沃還有一小時的行程。

巴沙金已經把將下車以前應當作的一切事情都作完了。他收攏了東西，把手提包的鎖扣全部扣好，用刷子刷了一下衣服，外套和便帽，馬上又站在擺動得很厲害的盥洗間裏的鏡子跟前，再一次地梳理着濕潤的頭髮，聚精會神地端詳着自己的相貌。然而，在臉上沒有任何新的東西。在暗淡的車廂裏的鏡子裏映照着的是一個看來三十五歲左右的人的面貌。一幅消瘦的、晒得黢黑的面孔之所以看來特別陰暗，也是由於那剪得短短的、向後披着的頭髮非常光亮，儼然就像麥芒一樣。光亮碧藍的眼睛在這幅陰暗的臉上看來似乎是多多少少有些褪了色一樣，但是常常密縫着眼睛的習慣却使得臉上顯露出一種微帶談諧的表情。

如果說，差不多每個人都很微妙地和某一種動物類似這樣說法是實在的話，那麼巴沙金，似乎就最像一隻生着一對帶笑的眼睛並生着一隻翹得高高的，聽覺銳敏的耳朵的瘦長的牧犬。在巴沙金身上

表演這樣一隻耳朵脚色的是一縷發亮的頭髮，這一縷頭髮從童年時就狡黠地在頭頂的左部豎立着，而另外的頭髮却完全附貼着頭頂。這一縷引人尋味的頭髮，儘管經過剪修，經過梳理，却總是沒有屈服。卡加，巴沙金的妻子，曾不止一次地說過，這一縷頭髮也就是他的真正靈魂，而他，却莫明究竟地，在自己習慣的克制的性格下把這個靈魂掩藏着，使人們看不出來。好像這裏邊有部份道理。

他想起了卡加，狠狠地，而且快快不樂地用手指拭了拭由於常帶眼鏡形成的，從眼邊通到兩耳的兩道細細的、隱約可見的矇矓的綫條。他帶眼鏡已經兩年了。固然，他祇是讀書的時候才帶眼鏡，可是他有個習慣，每天都要讀書而且要讀很多的書，這樣，因帶眼鏡留下的綫條就越來越明顯了。

他希望卡加仍會喜歡自己，而且這個感覺跟着一步一步的走近家鄉，也越來越強烈了。

他闔住了眼睛，想了想他怎樣地去吻她。於是他馬上便憶起了在將近三年以前他們分別的時候，她的臉上的表情。他記得很多的，各種不同的，她的面孔：不太如意的，微笑着的，悲哀的，操勞不安的，令人憐愛的；但是在分別時的那幅面孔對他來說永遠是最可愛的。

他們分手是在四一年的五月，在莫爾達維亞，比里查的飛機場上。他用吉普車把她從前綫上接回來。到臨盆至多剩了不過兩個月的時候了，可是她的懷孕還差不多沒有被人察覺，於是她便因為他過早地把她送到後方去而生氣了。

她坐在汽車的最前面的座位上，在巴沙金與汽車夫的中間，一路上都沒有講話。祇是當念劇地轉彎時，當他們受到顛簸而他——因為怕擠着她溜邊地坐在坐凳的儘頭兒上——眼看就要從汽車裏甩出去的時候，她這才啊呀地驚呼一聲，用兩隻手牢牢地摟住他的脖子，但是即刻她就把手放開，依然是冷淡地默然不語，直到飛機場。

在飛機場上，飛機起飛前的整整一小時內，她簡短地，單調地回答着他的問話，一次都沒有抬起她那執拗地低低下垂的眼睛。

螺旋槳已經在轉動了。他把她的手提包送到飛機裏就回來了，而她却依然垂着頭，帶着那樣一種冷淡的表情站在樓梯的跟前。

「要起飛了。」飛機上的機械士通告了。

這時，她驕地抬起頭來，把兩隻手伸到巴沙金的脖子的後面，但却不靠緊他，在伸展開的手臂的距離裏久久地望着他，似乎是遠遠地記一記他的臉面。

而他也同樣地，被她的視綫所征服了，並不打算把她抱過來，在忖度着她臉上那因別離引起的悲傷與恐懼，這悲傷與恐懼使得他很想撲到地上，抱住妻子的兩膝，並且——即使隔着鋪滿灰塵的大衣也好——吻它們，並傾吐一下自己對她的愛情。

在因塵土而變得發黑的卡加的臉上，兩隻眼睛顯得格外的大而且凝然不動似的。稍嫌寬大了些的衣服領子圍繞着她那有些消瘦了的，可愛的，由於砲彈炸片刮傷後留下了一個小傷疤的脖頸。……

一個螺旋槳放足了馬力。卡加頭上的髮夾滑了下來，於是她的發暗的長髮便飛起來，就這樣地在氣流中飄蕩着，飛舞着，同時又像停在空中沒有動。但她沒有注意牠們，繼續地望着巴沙金。

就這樣他也記住了她的面孔：悲傷地抿得緊緊的嘴唇，嘴唇上帶有風乾的小小的裂紋，凝然不動的炯炯的眼睛，飛舞着的長髮。

巴沙金在每過路軌接合點都在引起震蕩的車廂裏的走廊裏來回走了兩。以後，便回到車間裏，在窗前坐下了。

天氣很冷。冬天的風吹透了陳舊的車廂。佔有着兩個下層單舖的一對夫婦，在瞞怨着，說是他們還不如坐普通座位好了：那裏人多，因此也就比較暖一些。

巴沙金從窗子裏望着那清一色的，迎面飛過的白茫茫的田野，在思索自己的生活。

這個生活的開頭，是在這裏，在斯摩林斯克省，三十四年以前；而今天，經過了各種周遊以後，生活的循環又把他引回到這裏來，引回到從前的地方來。可是，這是絲毫不足為奇的：勿寧說，正是應當得到這樣結局。

在他那舖蓋着綠呢子的，陳舊書桌上邊，放着一個玻璃墨水瓶。當着母親擦桌子的時候，便移開墨水瓶的位置，在墨水瓶下面便看到一個艷綠色的圓圈。於是這個圓圈便惹人注意，而且改變了整個桌子的樣子，直到把墨水瓶放回原來位置時為止。他的腦子裏產生了一個可笑的想法：實際上，他今天就像這個墨水瓶一樣，不過是把他放回原來位置就是了。

他沒有看見母親比起沒有看到妻子的時間，要悠久的多了——已將近六年。

從來信裏所知道的就是這樣一點點：他們在斯摩林斯克的住宅被燒燬了；母親曾參加過游擊隊，現在住在普哈沃姐葉琳娜家裏，在那裏教書；葉琳娜的丈夫，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康特拉索夫，曾參軍作戰，可是在四三年復員了，而今天，和在戰前一樣，幹着舊職業，從事土木建築；弟弟舒佳成了一隻手的殘廢從前綫歸來了，現在在斯摩林斯克學習，他住的學校正是戰前巴沙金執教的學校。幾乎是家家戶戶都遭受了不可彌補的損失。母親的弟弟，舅父華夏在莫斯科自衛隊中犧牲了；而在戰爭

就要結束的時候，格里果里·法捷依赤第一房妻子薩兒子安納德里陣亡了。他是在空軍中服務的，死後被追贈以蘇聯英雄頭銜。

常真說，這就幾乎是巴沙金在這幾年中對自己家族所了解的全部情況。

關於卡加，他知道的稍微多些，他先先後後地，從地球的各個角落裏收到了她五封信。他知道：她給他生了個兒子，現在同他母親住在一起，在鐵路醫院裏當外科看護士。這些信追趕着他，在完全不能預定的行程上轉來轉去，而他也就不能確切地判定一共寄來多少信和多少信寄得沒有影了；他也不知道：他的回信中，那一些卡加收到了和那一些沒有收到。

卡加寫的信是簡短而且不可思議的；它們就像一個極力抑制着不哭出來的人底一幅面孔一樣。眉毛高聳着，眼角顫抖着。看這些信和重讀這些信，對巴沙金是痛苦的。它們並沒有給他說明任何事情。

有時，他覺得這些信之所以如此短促是因為她過於愛他，她沒有他便不能生活。這時他便回憶着他們分手時她的面孔，心平氣和地想着，她的來信像那幅默默不語的面孔。有時她那每封信裏全都一樣的幾行結語：『願你健康，我和葛黎沙，強烈地吻你』會使得他發狂，使他感到有一塊令人絕望的高高的石牆，他既不能毀掉它，也不能繞過它，要看看它後邊在發生着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

戰爭結束後，已經快兩年了，而他還祇是在回家的路上，在這整個時間裏，既沒有任何機會去休假，也沒有任何機會把妻子接到自己跟前來。

正如生活中的慣例一樣，在卡加離開前纏纏了幾天以後，意料之外的，不太重要的情況突然地闖進了巴沙金的命運中，於是便完全沒有預想到地改變了他的生活。

下半夜的時候，當他因燥熱的天氣而感到疲憊，正躺在長得非常茂盛的青草中——青草掩蓋了一切：彈坑，甚至砲車走過後留下的新的轍溝——的時候，忽然聽到一聲向下降落的飛機的吼叫，隨着這一聲吼叫是一聲近在咫尺之間的，震耳欲聾的巨響，就好像用一個大鐵錘到了一塊巨石上所發出的聲響一樣。

一架美國轟炸機，完成了從意大利到波爾塔瓦的穿梭飛行以後，機翼着地地被迫降落在玉蜀黍的田野裏，距離巴沙金指揮的反坦克砲兵營陣地半里路的地方。

一切就從此開始了。突然地，發現了第一個款待了飛行員們的巴沙金，在全軍團中懂得英文最好，於是便命令他把美國人帶到前綫司令部去。

不過，在這頭一次，整個的事情就這樣地結束了，而巴沙金自己也很快地就把這點小事件忘掉了一個地方，在前綫幹部科裏，從保險的文件箱裏抽出了一份履歷表：大學程度——列寧格勒工業大學畢業，懂外國語：英文懂得好，法文差些。把抽出來的，上面作了記號的這份履歷表單獨地放了起來，而把那張上面與其他人的姓名一起也印上了巴沙金的姓名的表格，已裝進了皮上寫着「呈報」字樣的布製的公事夾內。然後，藍色鉛筆寫上的批字是「批准」，紅色鉛筆寫上的批字是「同意」。美國人在馬賽登陸了；於是很小的，很有力量的，整齊清晰的筆跡，在帶有一個小紅星的公文用紙上不停地劃着，用特號字寫着結語：「調赴遣僑工作委員會分配工作。」

在一九四四年的九月裏，經過了三天的穿越伊朗、埃及、阿爾及耳和地中海的飛行，少校巴沙金在馬賽左近的一個廣大的、野草叢生的飛機場上，下了飛機。

他稍微感到有些頭暈了。這主要的還不是因為疲勞，而是由於過多的感觸。這裏，天氣溫暖，又十分靜寂。他聽到好像有什麼東西，不知是個甲蟲還是個蜜蜂，在頭頂上嗡嗡了一陣便落到草叢中去了。藍色的天空，澗然不動地佇立着，儼然就像在畫片上一樣，從地脚起直達高空。整個的身體浸潤在疲憊人的，南方下午六點鐘的暖流中間了。巴沙金摘下軍帽，把它翻轉過來，疲倦地用手帕揩了揩軍帽的內部。

他的砲兵營現在在普洛也什基附近的一個地方作戰。很顯然，是如此的。假如在董香花時候沒有戰鬪，那麼參謀長通常是在此時，下午八點鐘，坐下來準備寫彙報的。可是，這一切到如今與巴沙金是毫不相干了。他再一次地用手帕揩了揩他那嶄新的軍帽，蔑視地用手指彈了一下那漂亮的，發着光的帽沿，便戴到頭上了。原來的前綫生活結束了。開始了新的，出乎意想之外的，而且是還沒有完全理會到的一種生活；又有誰知道在這個新的生活中等待着他的將是什麼呢。

在飛機場上，就好像在草地裏飛跑着的一隻狗一樣，忽起忽落地奔馳地駛來一輛做棚的小汽車。舵輪後邊坐的是一位穿蘇聯軍服的軍官，頭戴一頂如巴沙金的軍帽同樣嶄新的軍帽，金色的肩章也同巴沙金的一樣。他用一隻手開着汽車，另外一隻手在空中揮舞着，而且在向巴沙金呼喊些什麼。

新生活的開端就這樣被記憶下來：碧藍的天空，青黃色的被焚過的飛機場上的土地和在草地裏起伏奔馳的小黑汽車……

在法國飛機場上的這開始的幾分鐘內，並沒有什麼驚人注意的東西；它們之所以被留在記憶裏，

只不過是因爲它們是個開端，而且也是因爲，在最近幾年來的許多往事所繚繞成的一個大綫團上，它們是突出的，就好像是一根綫頭一樣，爲要不把綫團搞亂，就應當從這個綫頭開始把整個綫團倒纏開來。千萬里長的綫索都在一個單人的粗率匆忙中被縱橫交錯地纏在這個綫團上。法國的潔白馬路，德國的柏油公路，荷蘭的深暗的運河，大西洋的捲在白色水花中的綠色的浪頭，最後，還有美國的精心修建的筆直的汽車路。巴沙金有時竟覺得他的記憶變成了噴霧的十字路口，許多往事都經過這十字路口，互相衝撞着，互相擊擊着，向所有這些交叉的道路上奔馳。

有些到過外國的人們，他們那種本能的愛國主義和他們那種同樣本能的對周圍一切事物的敵視態度，有時竟變成了自己的一種遮眼，這遮眼妨害他們看到與認識其不熟悉的世界。巴沙金却不是這類的人物。

用強力給牲口戴上遮眼，是爲了牠不駭怕生人。那些自願地把遮眼帶到自己眼睛上的人們，在巴沙金看來，一部分是胆怯鬼，一部分是精神上的怠惰者。對自己之一切無條件的贊揚及對外人之一切同樣無條件的責難，巴沙金覺得並不是精神力量的佐證，而相反地，只是這些人們的無能的標誌。他們沒有足夠的精神去較另外世界優越的感情，而取得這個優越感是可能的，不必否定自己固有的好的地方，要承認美國的汽車路和設有冷氣裝置的電影院都是好東西，可惜，我們暫時還不可能有這些東西。他們憶起祖國時，便無例外地贊揚一切，於是人們就不信他們的話了。可是，在大多數的場合裏他們是喜歡緘口不語並不捲入到爭論中去。

當着在他們終究爭吵起來的時候，那爭論也總是常常轉入到半玩笑的對俄國的深塘，魚子、油餅和伏特加酒等東西的吹噓上。

這一點總是引起巴沙金的憤慨，而他也不能理解，在經歷了和他一樣的勞動生活的他的同年裏面，某些人，怎麼竟會突然地在談話中間露出了這樣一些臭名昭著的商人思想。雖然他們本人，事實上比起他們底談論，甚至於比起他們時常並非十分嚴肅地談論魚子和油餅來說，他們是不知要好多少而且聰明得多少，但巴沙金覺得，總還是一種降低身份的，可恥的東西，毫無意義的助長着那些對俄羅斯來說不對頭的糊塗概念。

有一次，在華盛頓的大招待會之後，巴沙金會同自己在採購使團裏（他當時就在這個使團工作）的一位同事尼古拉也夫少校，因為這一點爭吵了一頓。

他們回到他們住的旅館底房間以後，衣服已脫掉了一半，各人在各人的床上對面坐着，不加思索地，繼續脫着衣服，氣憤地爭吵着。

「談到社會主義國家時，你可找到誇耀的東西了，——什麼澡塘和油餅都來了。」巴沙金帶一種叱責的口吻囁囁着，發狠地解着皮鞋上的帶子。

「可是你叫我對這位航空工業家斯登里君說什麼呢？難道講歷史不成？」

「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有一件事：永遠要保持自己的本色。」

「聽我說，」尼古拉也夫從頭上把襯衫脫下來，緩和了語氣說，「當我把關於油餅的話插進來的時候，他那副鬼臉甚至都變得和善了呢。真是！」

「當然啦，是變得和善了！」巴沙金狠狠地把皮鞋往床下一拋，擱得那麼遠，使得他第二天早晨不得不匍匐在地上去取。「當然囉，他是變得和善了！」他重複了一次。「祇有一些澡塘和油餅的蘇聯，對他是沒有什麼可怕的。」

『不要鬧了！』尼古拉也夫說着，便鑽進被窩裏。

『我要鬧清！』

『可是在一個公牛面前多餘地搥一下紅手帕有什麼意思呢？』（註）尼古拉也夫在被子下面懶洋洋地應聲說。

『是面旗幟，不是塊手帕，衣袋裏是藏不住它的。』巴沙金喊起來了。

『不要喊。』

『我不能不喊！』

『怎麼也和你談不攏來，』片刻的沉默之後，尼古拉也夫說。想了一下，又加了一句：『在這裏你是很難同人們談話的——這裏需要外交，而你卻不會。』

『爲什麼我不會？我會。』被觸動了痛處的巴沙金，急燥地說道。『但只是我不同意認爲最好的外交就是碰到誰就和誰擁抱起來喝伏特加酒。』

『那可怎麼辦呢，他們很喜歡這一套。』

『而我可不希望人們爲了我能成杯地喝伏特加酒，而主要的是爲了把我當作傻瓜，而喜歡我。』

『可怎麼說呢，有時這樣作也是有好處的。』

『不對，這樣做，任何時候都是有害的。請原諒——今天晚上我簡直不能夠冷靜地看你一眼。你整整一晚上都在裝傻瓜和商人。』

註：西班牙鬧牛時，男子用紅手帕在惱怒的牛面前搖擺，目的是更加激起牛底憤怒——譯者

「可是你又有什麼建議呢？同他們開誠佈公嗎？」

「我對你沒有什麼建議。我祇不過是希望每一個同你，或者是同我，談話的人，感覺到我是個蘇聯人，感覺到我以引以自豪的不是在自己的俄羅斯有澡塘和魚子，而是些另外的什麼東西。」

尼古拉也夫沒有任何回答。他靜默地的輪着，望着天花板，用兩個手指殘酷無情地捻着他那花紋布美國睡衣底領角。

巴沙金以為他是發了氣，於是沉默了片刻，便低聲地喚了他一聲：

「萬尼亞！」

尼古拉也夫，依然沉默不語地，伸展伸展身子，用那強有力的，長滿汗毛的兩隻手緊緊地抓住了床的靠板——使得床的靠板都吱吱的響起來，於是他坐起來，把兩隻赤脚垂到地板上。

「去他媽的鬼！」他嘆了一聲，與其說是發狠地還不如說是絕望地。「再不能待下去了。我要回國！回國！」

在他的話裏邊流露着的那種痛苦的不能忍耐下去的心情，也使得巴沙金不由地跳起來坐在床上了。

「請求書呈遞過兩次了！」尼古拉也夫繼續地說。「我不去找老婆，也不去睡暖炕——派到那裏都成——到庫什加，到千島羣島，到他媽個什麼鬼地方去都成！祇要能在自己人們中間過日子就行。我也不需要一切此地的這些葡萄罐頭和蘋果餡的點心，除非我們成爲富國，沒有這些東西我也可以過活下去，而且將要工作，那怕一天十二小時工作我也幹——給多少工作就幹多少，而這個美國呢，就連想也不去想它——去它的吧！你信就信，不信就拉倒！」

「爲什麼不相信呢？我信。」巴沙金說。「我自己也思念鄉了。但是工作——莫非國外的生活完全不使你感到興趣了嗎？」

「請看一看有多少興趣，就是連一個手指的四分之一的興趣都沒有了。」尼古拉也夫在講話的時候，順便作着忿怒的手勢。「真是鬼迷了心使我過去學了英文！假如在履歷表上沒有他媽的這一項的話——本可以打完仗早已回家了。」

他又躺下來，用被子連頭蒙起來，在被子下面，用着有些嘶啞、悲傷、帶有輕微嘲笑的語調添加了一句：

「別加，我是不適合於生活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的。這也就是我的全部的苦惱。」

四

尼古拉也夫睡着了，或者也許是假裝在睡。但巴沙金却還是很長的時間裏睜着眼睛躺在床上，望着窗外，在這個月光明媚的夜晚，白宮底潔白的圓頂清晰可見。

尼古拉也夫呈遞了請假書，照他說來，是作得對的。他這樣一個人，似乎實際上也是回國好些。但是說到他，巴沙金，他是否適合於一個人生活於「資本主義包圍」中呢？最初幾個月裏，有時他覺得簡直是無容置疑了：「不，不適合。根本不適合。」一切的懸念都湧上心頭來：懸念着妻子，懸念着俄國的人們，俄國的自然景色，俄國的鄉言俚語。他爲了沒有期限的出使而苦惱了。由於這樣，甚至連計算在國外待過的日期也不能計算了。

他勉爲其難地習慣着對待很多事情：要習慣於對他完全陌生的那一套人事關係；要習慣於各異其

趣的人的興緻；要習慣於用「有利」這兩個字去代替「需要」兩個字；要習慣於這樣的情況，就是說你要講：「來吧，同志們幹吧！」時，也沒有講話的對象；而最後，也要習慣於一種情況，就是每逢話題從瑣屑小事轉到任何大事的時候，正義的道理在這裏都要拜倒在金錢的道理的腳下。

但更使他叫苦的是他要習慣於那樣一種計算人民損傷與苦難的複式簿記，當他帶領自己的反坦克砲兵營的時候，他會是不想去相信竟會有這樣的東西存在的。

在家鄉的時候，他從小就看慣了的是：人類的不幸只是不幸而已，額外再沒什麼了。此外他看到的是：差不多每個不幸事件或遲或早地都有它那使人厭惡的有利的一面。

在米蘭，他聽到一個意大利的靴鞋店的老闆連說帶笑地講述着在戰爭結束前的兩天內美國人如何巧妙地轟炸了捷克的「拔佳」靴鞋工廠（註）。這個意大利人高興的是因為這些工廠至早也得經過兩年才能恢復；固然，這主要是對美國人有利的，但他也受不到什麼損失，於是這個消瘦的，很像個上了年紀的僧侶似的老頭兒，滿了一杯酒，便爲了祝賀盟國空軍，樂以忘形地喝了起來。

在紐倫堡的一個酒吧裏，與巴沙金並肩坐在一起的兩個記者和一個英國偵察隊的軍官，他們幾乎不因巴沙金之在場而感到拘促地在爭論着關於俄國官方報導的死人七百萬這個損失數字的可靠性。由他們爭吵的腔調裏可以確切地看出：他們很希望這個官方報導的數字小於實際上死亡的數字。

「但是即便他們報導的數字是確切的話，」他們中間的一個作結語時說，「七百萬也很可觀了。」他流露着滿意的神情講出了數目字。

巴沙金很想給這個人一拳。但可惜這正是他沒有權利能作的事。然而對此緘默不語也使他勢所不能。『而且在這種情況下面應當不應當緘默不語呢？』他想了一下，便連凳子一起轉了個身，而向着自己的鄰人們，臉色有些發白地，用英國話說道：

『你們在起初的時候，爲了使我們死七百萬，你們有意地把開闢第二戰場的時間拖遲了兩年，而現在只是因爲我們比你們多受了七倍的損失，你們便試圖着在和會上威氣凌人地同我們談問題了。你們的計劃不會成功的，請你們相信吧。』

開始沉默起來。繼而那個英國軍官，顯然是感到了些普通人由於廉恥引起的不自在的味道，於是便緩和着語氣說道：

『來吧少校，還是讓我們乾一杯吧！計算這些賬目，不是咱們當兵人的事情。』

巴沙金端起自己的酒杯，喝了一口摻水的『威斯克』，他頭上那一縷豎立的頭髮發了怒似的蓬散開來。

『可是你在何處作過戰？』他密縫着眼瞼問了一下那個英國人。

『我在聯合統率部任過職。』

『在什麼地方？』

『在南安普敦。』

『似乎這個地方是在英國的西南部。』

『對的。』

『沒有在這個戰場上待過。沒有待過的地方就是沒有待過。』巴沙金已經是不隱諱嘲笑的語句

了，他繼續說：「我本想同你們那些在敦刻爾克（註）作過戰的士兵們，按照當兵的一套談一談。現在同你們是扯不出當兵人的話的。祝你們健康吧！」他舉起自己的酒杯來，一飲而盡。站起身來，彎了彎腰，便向門口走去了。

這僅僅是許多次遇會中的一次，許多次談話中的一次。只要一談起俄國的傷亡，破壞和歉收的時候，這類的遇會和談話便厭倦人地重覆着。

「貴國毀壞了上千的城市，是真的嗎？」

「是，是真的。」

「絕對正確嗎？沒有誇大嗎？」

「是的。」

「自己恢復這一切，你們將會很吃力的。」

「是的，我們是很吃力的。」

對談者是一個鐵管製造公司的代表。該公司已經送交了四五汽船的鐵管——是供薩拉多夫到莫斯科輸送汽油用的。由於鐵管訂購太急，付出了較平常昂貴的購價。公司的代表想問一下巴沙金：這個訂貨是僅祇一次呢還是一系列的訂貨？但是老練的待人接物的經驗不允許他提出這樣的問題，於是 he 愉快地打了個口哨，重覆着：

「上千的城市，這相當多了！」

註：敦刻爾克——法國北部海港，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著名的一次英德戰役。

巴沙金望着他那心滿意足的臉，回憶着剛解放後羅斯托夫的冬天的廢墟，被冰雪封凍起來的磚塊的殘垣頹壁，一條空曠無人的，死寂的街道，街道上一個孤苦伶仃的男人，拖着雪橇，順着馬路慢慢地移動着。那男人把繩子套在胸脯上，雪橇滑着，有時便橫起來走；雪橇上拉的是一口小小的兒童棺材，棺材是用兩個膠合板紙烟箱子釘成的。木板上還寫着：「獨佳特（註），頓河——羅斯托夫出品。」

「怎的你默默不語呢？」對談的人問巴沙金。

巴沙金望着他的臉，默不作聲。

那邊是在臨離開美國時候的事情：這次巴沙金的對談者原來是位右派的名記者。話又談到關於糧食問題了。

「據說貴國今年是空前未有的歉收。是五十年來所未有的。是嗎？」

巴沙金說明了是如此。

「我聽說貴國已經減低了配給糧食的標準。在糧食問題上你們今年將是很困難的。」

巴沙金盯着自己的對談者的臉。對談者在傲慢無禮地闡述那一套在俄國勢將遭受飢餓的想法。這人甚至並不想在臉上表現一下同情心。不，他講話時的表情是心滿意足的，在話語停頓的時候他在微笑。

巴沙金與這位記者相逢已不是第一次了，並且也知道，他不是獄吏也不是殺人兇手，他不生吞幼

註：獨佳特為一種紙烟的牌子。——譯者